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孙士杰

杜威是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最知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是西方现代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创建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领导的进步教育运动给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以致命的批判,使20世纪的西方教育史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尽管杜威的教育思想存在有极端、片面之处,但它对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改革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

杜威是一个机能主义心理学家,他认为心理活动的实质在于有机体采用一定的行动适应环境并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适应”是一种诸如情绪、习惯、冲动等的本能活动。这种本能人在出生时处于一种未成熟状态,蕴含着极大的生长、发展的可能性。教育的任务就是按照儿童生长的不同阶段供给适当的材料,促进本能的表现与发展。可见“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或青年去吸收,而是须要使人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①

杜威据此对传统教育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他在《学校与社会》一文中分析批判了传统教育忽视儿童本能的弊病,明确提出教育要以儿童为中心。他说:“为了说清楚旧教育的几个主要特点,我或许要说得夸张些:消极地对待儿童,机械地使儿童集合在一起,课程和教法的划一。概括地说,学校的重心是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其他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中。……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改,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②

杜威认为在新教育中,每种课程、每一科目都应以儿童为起点,儿童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发展,儿童的成长,就是理想所在,只有儿童提供了标准,对于儿童生长来说,一切科目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它们是工具,它们以服务于生长的各种需要衡量其价值。个性、性格比教材更为重要。不是知识和传闻的知识,而自我实现才是目标。”^③

杜威认为以“儿童为中心”并不是把教师置于次要的地位,教师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只是教师起主导作用的方式变了。他在《思维与科学》一书中写道:“教师在旧式教学里是独裁之王,在新式教学里是无用之物。但在事实上,他应该是一个社会集团(儿童与青年的学问的集团)的领导者。他的领导,不以地位,而以他的渊博知识和成熟的经验。若说儿童享有自由以后,教师便应逊位而退处无权,那是愚笨的话。”^④他又说:“为了减轻教师的领导和责任,有些学校里,不让教师决定儿童的工作,或安排适当的情境,以为这是独断的强制。……不由教师决定,而由儿童决定,等于让偶然的事情、偶然的接触来决定。……你不让教师来决定,不过以儿童的偶然的接触,代替了教师智慧的计划而已。教师有权为教师,正是因为他最懂得儿童的需要和可能,从而能够计划他们的工作。”^⑤

我们不同意杜威把心理实质完全看成是本能的活动,因为他否定心理实质的社会性。但是,杜威从本能心理学出发,高度评价儿童发展的潜在可能性,要求教育要给儿童的“本能生长”提供条件以促进其发展。这种观点则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成长与他所处环境、所受教育以及他的先天素

质和主观能动性分不开。一个人的天赋是一定的，所处环境所受教育以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一个人天赋才能的展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教育要为儿童天赋才能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刺激，以促进每个儿童在特定的天资基础上得到充分发展。在今天我国的学校教育中由于传统教学思想的局限仍然存在着不重视，甚至压制儿童的天赋本能、不重视儿童的主体作用，把儿童当成被动的知识的容器等偏见，认为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理想任意地塑造下一代，这是一种不民主的无儿童的教育观。这种教育观杜威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给予了尖锐的批判。杜威认为这种教育观是从上面或外面对儿童施行强迫教育，而无视儿童内部的本能和倾向，使教育完全成为一种“外在的压力”。所以杜威号召要把教育的中心转移到儿童身上，教育的一切措施都要围绕儿童来实施。这些教育改革的主张对今天的我国教育改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变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要想使儿童成为时代的主宰者，必须发挥儿童的积极主动性。

二

杜威从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形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因是带有人类原始本性的结合。他说：“个人与结合或社会的关系有如字母与字句。字母拼合成字句，个人连合成社会。”^⑧教育对发展人性、启发智慧有非常巨大的作用。所以，杜威认为，教育对改进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杜威还据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这鲜明地反映了杜威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

杜威又认为人性的发展、智慧的激发离不开生活过程。他说：“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即是生活。”^⑨杜威坚持学校与眼前生活的联系，主张教育即是生活本身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他认为，如果使教育为儿童未来生活作准备，那就必然要教给儿童成人的经验、责任和权利，而忽视了儿童眼前的生活和儿童的日常经验。

怎样才能使教育与眼前生活和日常经验联系起来呢？杜威明确提出应该把学校改造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在那里，儿童通过直接生活进行学习，而不只是学习课文的地方”。^⑩杜威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这个变革已经在进行”这些变化“意味着使得每个学校都成为一种雏形的社会生活，以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作业进行活动，并充满着艺术、历史和科学的精神。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每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我们将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的最深切而最好的保证。”^⑪

杜威主张“学校即社会”有其政治目的，即在雏形的社会——学校里培养资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我们应该批判的。但是杜威主张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反对传统教育只重系统知识和成人经验而不重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学校与生活的联系则是积极意义的。杜威认为，由于民主和现代工业的出现，世界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我们不可能明确地预言20年后的文化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不可能让儿童去适应某种定型的状况。只有加强学校与社会、学校与生活的联系，把学校办成雏形的社会，才能培养儿童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我们认为，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理论不仅对当时教育改革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今天的教育改革有借鉴意义。我国目前的大多数学校仍然只强调系统知识和基本技能而忽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脱离现实的社会需要，致使学校培养的人不了解社会、脱离社会、不能适应社会。现在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广泛进行的国情教育、在大中学生中开展的假期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为了让了解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我们认为，学校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不能脱离基础知识的传授、基本技能的训练而把学校

改造成小型社会，但是如何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使学生从小就开始认识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社会规范，则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杜威不但强调教育教学要联系儿童的日常生活经验，更注意丰富儿童的日常经验。杜威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日常生活的教育价值日益减少。他说，现在（指20世纪初）儿童生活在一个制造物品的世界，儿童在看见服装前就没有看见过布，来到饭桌前就没有看见过粮食，只按一下电钮就可以开灯照明。而一个世纪前（即18世纪、19世纪）乡村儿童的日常经历是很丰富的，他们看到自己的邻居从剪羊毛到操作织布机织布的全过程，而房间照明则是从饲养牲畜、炼油、用灯芯插蜡烛等一系列辛勤的劳动而来的，因而他们平常的生活具有较大的教育价值：“无论在智识方面和道德方面都比今天儿童的情况好。在分担家务工作上，他建立起自觉的思想和品质。每日的工作可以引起的丰富的学习动机，而现在明显地不存在了。”^⑩所以杜威强调，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教育环境的改变，传统的学校也应加以改造，改造成生活的学校。

我们认为，杜威这种根据社会生活情境的变化，学校也要做相应改造的思想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教育改革思想。我们知道，每一个社会领域的变革都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相应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也要求有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由于教育所处环境的变化，往日的那种静听的课堂教学形式就需要发生改变。我们今天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城市中早已不复存在，在农村中正在迅速解体，儿童的生活环境正发生着急剧变化，日常生活的教育价值正日益减少。怎样弥补日益减少的日常生活的教育价值、丰富儿童的日常生活经验正是我们今天教育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

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经验”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心概念。杜威认为“经验”是现实世界的基础，他宣称自己的哲学既可叫做“经验的自然主义”，又可叫做“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他认为“经验表现为认识自然、深入自然奥秘的方法，并且是唯一的方法。”^⑪杜威还指出：“经验包含主动与被动两个要素……在主动方面，经验是尝试……在被动方面，经验是承受所成的结果。”并且认为，主动与被动这两种因素“愈有关联，就愈有效果，或愈有价值。”^⑫杜威认为，经验是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相互作用，是说有机体不仅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且对环境起着作用。其结果是环境中所造成的变化又反过来对有机体及其活动起反作用。“行动与遭遇的这种密切联系，就形成了我们的所谓经验。”

杜威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基础上，极端强调操作、行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观念、知识、经验是在操作中、在行动中、在新的探究过程中获得的。杜威把教学过程完全看成是“做”和“行动”的过程。他认为在教学过程中，不是教给儿童既有的科学知识，而是让儿童在活动中自己取得经验，用杜威自己的话说即：“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和改组。这种改造和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⑬

杜威力图用“做中学”的方法论改造传统教育，认为传统教学是以前人知识、课堂讲授和教师作用为中心的，它完全不考虑真正的中心：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他指出：“教育最根本的基础在于儿童活动的能力。”“使儿童认识到他的社会遗产的唯一方法是使他去实践。”^⑭在《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人们最初的知识，最能永久令人不忘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How to do）的知识”，为此，就应该遵循着这种获取知识的“自然途径”为学生“设备相当的环境，使学生‘由做事而学习’（Learning by doing）。”^⑮杜威根据他的这一思想改造了传统的教材、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用活动作业代替传统教材，用在活动中学习代替班级上课制，用学生主动来反对教师中心。

杜威这种“做中学”的教学理论虽然存在着用一般代替特殊、忽视学校教育特点、在实际中导致学习

的低效率等致命缺点。但是，他强调教学过程中的儿童作用、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学习等观点和做法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有借鉴意义。

首先，“从做中学”能促进知识与智力的同步发展。儿童是人类的一部分，他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人类认识的缩影。他们认识客观世界同样要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规律。儿童入学以前在自己的生活中已通过感官和自己的亲身活动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感性经验，学会了说话和初步的思维能力。这一切为他们进学校受教育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学生一旦进入学校大门，他们原来的那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将发生改变。他们将主要通过语言和文字间接地认识客观世界。而学校里传授的人类认识世界的成果对学生来讲大都没有真情实感，学生只能靠理解和记忆去掌握。这种认识方式就限制、阻碍了学生智力的发展。而“做中学”要求儿童从活动中学习，从实践中获得经验。这种认识方式不仅符合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也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所以“做中学”不仅有利于儿童掌握知识、获得经验，而且有助于学生智力的发展。

其次，“从做中学”有利于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尊重儿童、使儿童个性自由发展”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类进步教育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极力倡导“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⑩但是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和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阻碍了这一理想的实现。“从做中学”的方法是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由儿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兴趣选择活动的内容。同时以小组为单位采取分工协作的方式由个人独立完成的任务，然后再一起总结经验学习书本中的知识。所以它有利于每个儿童在教学过程中进行自由思考和根据个人的爱好选择喜爱的活动，从而能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向自己所喜爱的方向发展。这样就改变了儿童消极等待教师传授知识、全班学生按一个模式发展的现象，使儿童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有利于学生充分自由地发展。

必须指出，杜威作为资产阶级教育家，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同时，建基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庸俗进化论的社会学和生物本能论的心理学之上的教育理论的许多方面是片面的和错误的，对此我们必须予以批判。但是，无可否认，杜威的教育思想的确蕴含着一些真知灼见，它们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失而失去光辉。只要我们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不带偏见，立足于借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一定会从中受到诸多启发，有益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发展。

注释：

①③ 《明日之学校》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二年月初版，民国二十四年国难后第二版，第1、79页。

②④⑤⑥⑦⑧⑨ 《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2、21、28、266、159、7页。

④⑤ 《教学与思维》，孟宪承、俞庆棠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46、246-247页。

⑥ 《杜威哲学（上）》，赵一苇等译，台湾世界书局1979年版，第299页。

⑦ 《杜威三大演讲》第3页。

⑧ [英]博伊德、金合：《西方教育史》任宝祥、吴无训主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92页。

⑨⑩ 《民本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七年三月初版，民国三十六年五月第二版，第163、211-222页。

⑩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2页。

（责任编辑 徐 忠）